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意〕德拉-沃尔佩 著

赵培杰 译

卢梭和马克思

MANJ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选读 • 重庆出版社



卢梭和马克思

YANJUUCONGSHU
YANJUUCONGSHU
YANJUUCONGSHU

(川) 新登字010号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Humanities Press Inc. , 1979

根据新泽西人类出版公司1979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颜尚贤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风

【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著 赵培杰译

卢梭和马克思

重庆出版社 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4 字数140千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2213-9/B·58

定价: 4.00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 崇 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

4.9.5
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

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

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

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者 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的主要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德拉-沃尔佩思想的研究，或者更广泛地说，对“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不多。人们对它的兴趣也是近来的事情。在中国，只是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中，对德拉-沃尔佩以及以他为思想领袖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过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研究，后来这方面的研究就不多了。这就是说，人们并未充分重视这一思潮的思想和影响。从我们应当全面地了解、分析、批判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这一点来看，不能说这不是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缺陷。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显然有必要对德拉-沃尔佩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情况作一简单陈述，以便使那些对这些基本情况不太熟悉的读者能够更深入地去读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 1895~1968)出生在意大利波伦亚附近的伊莫拉城。1938年他被聘为墨西哥大学的哲学教授。30年代，他专注于对休谟的研究。从40年代起，他致力于对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哲学家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并由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研究。1950年，德拉-沃尔佩的《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一书出版。该书“通过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休谟的批判性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去

探究和追溯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德拉-沃尔佩否定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运用抽象概念解释特殊事物，而这在科学上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强调说，科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对黑格尔的颠倒进行了颠倒，这是非教条主义的、非形而上学的和面向事实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假定”了这种联系。《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的出版，标志着“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1956年苏共20大和匈牙利事件之后，意共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疏远和脱离政治的趋势，知识分子党员大多退党。而德拉-沃尔佩是留在党内的少数著名学者之一，他同科莱蒂等人主持意共主要文化刊物《社会》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在1957年出版了《卢梭和马克思》一书。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他也因此成为“战后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62年，由于与意共领导在理论上的分歧，《社会》杂志被勒令解散。此后，德拉-沃尔佩专心于理论研究。1965年，他从墨西哥大学退休，1968年去世。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盛行于50年代和60年代意大利理论界的一种思潮。德拉-沃尔佩是这一思潮的初创者和思想领袖。但是，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学派。“所谓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实际上仅仅是几个注重和发展德拉-沃尔佩思想的个人，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美]罗·戈尔曼编，赵培杰等译《“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第220页）。除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外，其中的重要人物还有潘切里、罗西、伊·安布罗齐奥。虽然他们之间在理论观点上各有

不同，但总起来说，又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作为对“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反对到黑格尔思想中去追寻马克思辩证思想的根源；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科学辩证法”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对立的。

第二，反对过分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而贬低或忽视马克思后期著作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不赞成以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去否定或排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提倡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的连续性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三，从研究的方法论看，德拉-沃尔佩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论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就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历史编纂学-文献学”的重建方式。

第四，强调“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确定的和面向事实的。由此出发，“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自然与社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内在逻辑统一，但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证的方面的倾向。

从以上几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从它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错误倾向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进行这样一个“纠正”的时候，它又简单地“否认在摒弃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拯救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任何可能性，断然否认马克思辩证法同黑

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任何连续性”。它“不顾与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原则对立，按照新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把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归结为以‘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为符号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这样，“就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宗派的、封闭的解释，另一方面又陷入到相信客观实在是可以在经验的抽象(或科学的具体)的基础上简单地推演出来的实证主义唯心主义之中”(见徐崇温著：《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重庆出版社，1990，第36～37页)，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和“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相比的“反向歪曲”。

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一书是一本论文集，在意大利理论界曾产生过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从1957年到1964年曾连续出了四版。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政治论文，着重阐述自由、民主、平等、法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目的在于探讨卢梭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的渊源关系及本质差异，强调卢梭的自由观在现时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现实意义；另一部分是哲学论文，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实质和基本公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论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一、政治论文(社会主义和自由)

德拉-沃尔佩在政治论文中集中探讨个体的自由问题。他认为这是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和自由(或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德拉-沃尔佩首先探讨了卢梭自由观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在卢梭关于(平等的)自由的论述中包含着

活生生的内容，卢梭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部自始至终渗透着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著作”。他强调指出，由于人们过多地注重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来源，“卢梭对平等的独创性研究被忽视了”，因而也必然忽视马克思与卢梭的思想渊源关系。此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他们自己同卢梭之间的思想联系也没有正确认识。

德拉-沃尔佩认为，卢梭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一书中就已提出了类似马克思的见解，即提出了人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問題。但是，他对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卢梭持一种前后不一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在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概念之中沉积着大量的黑格尔主义的残余”。

在谈到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两个灵魂”时，德拉-沃尔佩认为，“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两个方面或两个灵魂就是由议会制民主或政治民主开创的，并且由洛克、孟德斯鸠、康德、洪堡和康斯坦特在理论上加以阐述的公民的（政治的）自由，以及由社会主义民主确立和实行的，并且由卢梭首先进行理论阐述，尔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接或间接加以发挥和发展的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同时，德拉-沃尔佩还指出，马克思和列宁虽然继承了卢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但卢梭的思想在他们那里被置于一个革命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取代了卢梭本人所使用的已经衰竭的唯灵论的资产阶级方法。

二、哲学论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看法）

德拉-沃尔佩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看法主要见于《关于

1843年和1844年的哲学遗著》、《关于〈哲学的贫困〉——科学的分析辩证法问题的出现》、《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这三篇论文中。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所坚持的是“科学的辩证法”或“分析的辩证法”,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先验的辩证法”、“思辨的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或“神秘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揭露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思辨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与此同时,马克思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科学的辩证法”,并同恩格斯取得完全的共识,他们先后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两部巨著中特别地运用了这种辩证法。

德拉-沃尔佩在本书中继续了他最初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中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验的”(伽利略式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把认识论的钥匙,那么,马克思的著作将是晦涩不明的。

德拉-沃尔佩指出,对方法原则进行逻辑-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是他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的主题。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可以表达为“由具体或实在到观念的抽象,然后又回到前者去的一种圆周运动”,或者说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

从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政治思想和辩证法的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他重视马克思与卢梭在政治思想上的联系是正确的,而且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平等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这

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决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恩格斯特别强调说：“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来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2、180页。）然而，在尔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的研究中，却仅仅注重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实际上只是注重黑格尔的传统，而忽视了马克思从其他哲学家，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那里吸取的营养以及同这些思想家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和不足。当然，像德拉-沃尔佩那样，把卢梭的见解和马克思的见解这样那样地等同起来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事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不是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所以，恩格斯说“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另外，德拉-沃尔佩在探寻马克思与卢梭之间联系的同时，又否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反向歪曲”。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也不能建立起来”，“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十六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9、180页），说到底，断然否定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没有根据的。

在辩证法问题上，德拉-沃尔 佩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本质区别是对的，但是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完全对立起来，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沿着实证主义的道路去“捍卫”马克思辩证法，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和溶解在具体-抽象-具体这样的公式和诸如归纳-演绎这样的逻辑范畴中，从而取消了辩证法，这种做法显然又是错误的。所以，事情的真相，不是在恩格斯那里“沉积着大量的黑格尔主义的残余”，而是德拉-沃尔 佩在割断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联系之后，滑到了新实证主义的泥潭中。

在目前世界局势动荡多变的条件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应当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盲目拒斥一切西方思潮，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探讨，就不可能从中吸取可借鉴的内容或思维的经验教训，更不可能真正发现这些思潮的错误。反过来，一味地“客观”介绍这些思潮，甚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搞不分精华与糟粕的“拿来主义”，也会犯相同的错误。这就是我在译完《卢梭和马克思》这本书之后所得到的启示。

赵 培 杰

1992年2月于北京

英 译 者 导 言

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1895~1968)是战后意大利最有影响、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他的大部分著作仍然不被英语国家中的人们所知晓。《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包含的诸篇论文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正是在40年代,德拉-沃尔佩从一个卢梭主义者迅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前,人们正在开展关于在“社会主义合法性状态”中继承和复兴直接的卢梭主义民主和康德主义的法律-立宪保证问题的讨论。德拉-沃尔佩的这些论文可以说是 对这一讨论的重要贡献^①。

这些文章中隐喻较多,而且许多地方也过于简练,因而给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带来很大困难。社会主义民主的卢梭主义因素和康德主义因素(这是它的“两个灵魂”)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平衡关系,要求我们特别注意着重点的变化和解释的不同。德拉-沃尔佩自认一贯忠于列宁的遗产和政治哲学,一贯忠于马克思对自由的代议制国家的批判,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

^① 德拉-沃尔佩的完整著作见六卷本的《德拉-沃尔佩著作集》(罗马:联合出版社,1972~1973),同时可参阅我的《德拉-沃尔佩思想导论》(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77)。关于德拉-沃尔佩的国家理论,在下列著作中,即丹·佐洛(Dani-lo Zoilo)的《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理论》(巴里:德登纳托出版社,1974),埃·阿加齐(Emlilio Agazzi)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中德拉-沃尔佩学说的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学院,1974),以及里卡多·古阿斯蒂尼(Riccardo Guastini)和里纳托·列夫莱罗(Renato Levrero)的《加兰迪的学说和民主纲领》(载《阶级》杂志1970年第3期)中都作过讨论。